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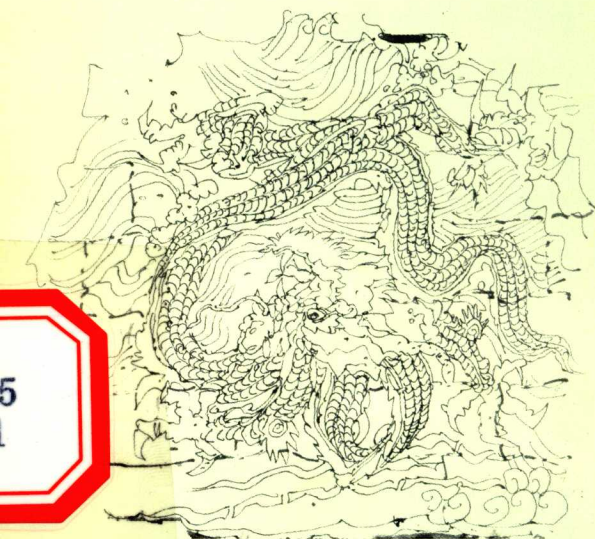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琉璃史话

柴泽俊
/ 著

古代琉璃,是我国陶瓷历史上杰出的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山西的琉璃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1500余年来,山西琉璃业相承不衰,历代都留下许多优秀作品,其分布之广,匠师之多,在全国居于首位。大量事实证明,山西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而且是我国琉璃艺术之乡。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冬梅

韩 慄

装帧设计 冀建海

插 图 朱连威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2辑)

山西琉璃史话

柴泽俊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 字数:300千字

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37-1

G·1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伟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琉璃的产生及汉代的绿釉陶	(1)
二、北朝时期的琉璃制品	(3)
三、隋、唐时期的琉璃业	(5)
四、宋、辽、金时期山西琉璃业的发展	(7)
五、元代琉璃业的兴盛	(12)
六、明代——山西琉璃艺术的鼎盛时期	(16)
七、清代山西琉璃艺术	(39)

琉璃,是以铅硝为基本助熔剂,经过800—900℃(最高达1100℃)温度烧制而成的陶胎铅釉制品,与瓷器的温度(1200℃)相比,显系低温。因此,琉璃亦称之为低温铅釉。它的胚胎,主要是用粘土(元代以后也有用高岭土的)做成。它的釉面,主要是用铜、铁、钴、锰、锡、铅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氧化铜可以使釉呈现绿色;氧化铁可以使釉面呈现黄色;氧化钴可以使釉呈现蓝色。这种低温色釉色调丰富,釉面光亮,品类繁多。两汉时期的釉陶;唐、辽、时期的三彩;元代的珐华器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古代琉璃,是我国陶瓷历史上杰出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山西的琉璃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1500余年来,山西琉璃业相承不衰,历代都留下许多优秀作品,其分布之广,匠师之多,在全国居于首位。这些作品除博物馆藏的出土器物外,还有牌坊、高塔、碑碣、影壁、神像、狮子、供器,以及众多建筑屋顶上的脊饰、吻兽等等。不少作品上,既刻有确切的年代,又留有匠师的姓名,历经上千个寒暑,诸多的社会变革,能保存至今,实为可贵。大量事实证明,山西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而且是我国琉璃艺术之乡。

一、琉璃的产生及汉代的绿釉陶

在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低温铅釉的琉璃,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品类。对于低温铅釉技术的产生,历来众说纷纭。但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实,与铅釉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琉璃器(料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相当多的品类。

我国最早有关琉璃的文字记载,是《孝经·援神契》中的“神灵滋液则琉璃镜”。西汉桓宽,将汉昭帝时有关官营盐铁的辩论集成《盐铁论》一书,其中《力耕》篇有“……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的记载。以后,东汉班固、班昭所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琉璃的记载渐渐多起来。其中《汉书·地理志》有:“五帝使人人还是琉璃。”《后汉书·西域传》有:“(大秦)国多金银奇宝,有夜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琥珀)、刘黎(琉璃)、琅玕……”。汉代著名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焦仲卿妻》)中,也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的描写。可见“琉璃”一词在汉代已常为百姓所用。

山西是我国琉璃的主要产地。汉代低温釉陶器皿,晋南出土者甚多,大多为明器。器形和工艺与陶器近同,表层铅釉多是绿色,考古学界一般称之为“绿釉陶器”,简称“釉陶”。器形有壶、瓶、鼎、罐、仓、柜、灶、盆、楼阁等多种日用器皿和明器。大多出土于太原、大同、长治、盐湖、闻喜、芮城、平陆、河津等地汉墓中。其中数量之多,以晋南(古平阳地区)为最;艺术之精,以盐湖、闻喜、平陆、河津、稷山、芮城等地出土的绿釉陶楼为佳。其中盐湖陶楼出于侯村汉墓中。楼为五层,下雕池塘。塘内刻鱼、鸭、龟、蛇、蝌蚪等水禽动物及水纹。楼居池中,四周平台伸出。一、三层有平台,无楼檐;二层台、檐皆备;四、五两层设楼檐而无平台。其中二、三两层外围,还雕有勾栏,栏下四周斗拱挑承。每层均有门窗,楼

檐上刻有瓦垅。楼内雕有正在表演的乐舞俑和杂技俑(汉代称之为“百戏”),墓主人坐观其间。制作精工,釉色纯正,是汉代琉璃明器较为别致的实例。

二、北朝时期的琉璃制品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北方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手工业难于发展。但是,到了北朝时期,山西地区处在北魏统治下,社会相对稳定,低温铅釉又继续盛行,这可以从不少出土器物中得到证明。

1966年发掘的大同北魏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出土了大量釉陶器物。主要有男女墓俑、大陶马、小陶马、驮粮马、牛、羊、猪、狗、鸡、骆驼、唾壶、器盖等等。皆用粗红粘土作胚胎,施绿色、黄色或酱色铅釉。器盖上还刻有莲花纹。其中几尊墓俑的装束较为别致:酱釉俑,面部无釉,单帽、短裳,似为夏装;骑马俑,风帽、长袍,右袖口对准嘴唇,是哈气取暖;绿釉俑,釉色深沉,面色呈蓝底色,体胖面润,风帽系于颈下,长裳围裹周身,似置于寒风之中,个个极富有生活气息。此外,该墓中出土的绿釉骆驼俑,双峰、昂首,制作十分精美。

1973年发掘的寿阳北齐河清元年(562)库狄回洛墓,出土了铅釉陶器30余件,有樽、盘、碗、杯、盒等五种器形。皆用白色粘土作胎,胚胎较后,有气孔,吸水力强。釉面淡黄色,光泽晶莹。其中莲花宝相纹樽最为别致。此樽胚胎厚度

不均，上薄下厚；短颈、鼓腹，伞状盖；遍体堆塑莲花瓣和圆片菊花纹饰。还有祁县韩裔墓出土的北齐天统三年（567）龙柄鸡头壶，白胎、深绿色釉。器身瘦长，颈部较高；肩部至腹部塑有凸起的覆莲六瓣；壶柄为一龙头，自腹部隆起衔至壶口上沿；对面伸出鸡头制成壶嘴，其形状别具一格。北魏绿釉陶器的纹饰，多为莲花纹，无论是刻划的还是堆雕的，都是受佛教影响的表现。

北朝时期琉璃，在使用范围上已突破了汉代日用器皿和随葬品的范畴，开始使用在建筑物顶装饰方面，这就使琉璃有了广阔的使用范围和更多的实用价值。北魏初自魏道武帝拓跋圭（371—409）之后，在京都平城（今大同市）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更烧制琉璃装饰于建筑物上。《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中载有：“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有。”这是我国低温铅釉制品——琉璃，使用于建筑物上最早的文字记载。从此（公元五世纪初），人们称建筑物上的铅釉装饰物为琉璃，视色釉器为“釉陶”。大同北魏古都遗址中，以前曾发现过琉璃碎片，胚胎中含有细砂，质地略糙，铅釉呈浅绿色。日本人田恭辅藏的《中国陶瓷的时代研究》一文，也刊有魏都琉璃釉陶碎片，这些都是北魏时期琉璃使用于建筑上的实物证据。到公元六世纪中叶，北齐宫殿上只有少数黄、绿色琉璃瓦，其它则多在青瓦上涂饰核桃油。由此看来，魏齐间尽在都城皇室建筑物上装饰琉璃部件。

三、隋、唐时期的琉璃业

隋朝统一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陶瓷业的发展表现在重要窑址在大河南北增建起来，在艺术造型及品色方面尚无新的建树。作为陶瓷业之一的琉璃业，在隋代仍承袭汉魏时期绿釉陶的特色，以日用器皿为主，建筑物上的瓦件仍为布灰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京城重新试用绿色铅釉饰件。应该说，在建筑物顶上使用琉璃初创于魏晋，而复试之功，当属隋代何稠。何稠，隋代兼掌“细作署”，唐初任“将作少匠”。从此，后世建筑屋顶上琉璃构建逐渐增多，到宋、元、明、清而遍及各地。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宗教的发展，隋代匠师已开始用琉璃制作佛、菩萨造像。

山西省博物馆陈列有隋代绿釉菩萨三躯，是近年修建南同蒲铁路时，在介休附近古寺遗址中出土的。像高0.68—0.71米，为立式。像下有仰覆莲座。身式修长，腹部维曲，胸臂袒露，胸前佩带缨珞，衣饰缠腰，罗裙紧贴着下肢，飘带自臂部垂于两侧，神态和装束均脱离了北朝风格而向唐代过渡。坯胎为粗坭捏成，略呈黄红色。全身衣饰和基座敷以绿釉：头、手、足、发、臂膀等袒露部份不施彩釉，仍保持着底胎本色，给人以苍古醒目之感。这是琉璃工艺运用于雕塑艺术和烧造佛像的成功尝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权稳固，经

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商业与交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制陶业很快超向高峰。陶瓷艺术中，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莫过于釉色富丽的三彩釉陶（又称唐三彩），这是唐代琉璃工艺的重要成就。其绚丽斑斓的色调，生动写实的造型，正是盛唐安富尊荣的反映。

唐三彩的制作，始于唐高宗（650—681）时期。山西太原、榆次、临汾、运城、长治等地已发现的唐三彩，多是俑类（包括人物俑和动物俑）。釉色有蓝、深蓝、绿、深绿、淡绿、翠绿、黄、白、赭、褐等多种。所谓“五色琉璃”在唐三彩器物上，得到了惊人体现。

太原西郊义井唐墓出土的三彩堆花瓶、平陆唐墓中出土的三彩虎枕等，造型、釉色都极富代表性。三彩堆花瓶，长颈、鼓腹，用沥粉勾勒成宝相花纹，表面施黄（微褐）、绿、白釉。花纹精细，光泽晶莹。虎枕，伏卧式，足、齿皆白色，面施绿釉，黄褐色皮毛，双目圆睁，虎视眈眈，烧造工艺颇佳。

唐代除制作琉璃器物外，建筑物上使用琉璃作为装饰物的地域和范围，比前显著扩大。就目前所知，山西介休等地的重要建筑物上，皆用琉璃吻兽和瓦件。最近，山西介休县洪山村出土的唐贞元十一年（795）法兴寺界限碑中，有“西至琉璃寺”的记载。既有琉璃寺，必有琉璃制品和装饰部件。寺址距唐、宋间介休古瓷窑址仅3公里。附近森林茂密，又盛产煤炭和陶土，为烧造陶瓷和琉璃提供了充足的燃材料。由此，介休烧造琉璃的历史，似可上溯到唐贞元十一年（795），而古法兴寺和琉璃寺的琉璃应是在这里烧造的。此外，据杜工部诗中“碧瓦朱甍（屋脊）照城郭”之句分析，也可

推知唐时京师建筑使用的情况。碑刻、文献和已发现的实物证明,唐代我国北方的一些重要建筑已广泛采用琉璃装饰了。

唐时,山西瓷业大兴,窑址逐渐增多。在长治壶口、浑源古瓷窑、朔县吴家窑等地遗址实地勘察中,曾发现琉璃碎片。其中长治、浑源两地碎片为白坭胎、绿釉面,釉色较淡,釉面比后世之作微薄,与渤海国唐代宫殿鸱吻近似,应是唐时烧造琉璃的遗迹。后来用于建筑物上,由于构件体积大,数量多,固定窑址烧造,装卸搬运十分困难。随着寺庙的兴建修葺,琉璃匠师与砖瓦匠师一样,常就地捏制,就近烧造。

五代十国为时短暂,又是唐末地盘割据的战乱时期,但山西琉璃业的发展仍未间断。现存北汉天会十四年(970)介休《洪山寺重修佛殿记》碑中载有:“椽铺玳瑁,瓦甃琉璃”。证明当时介休洪山寺大殿上是有琉璃构件的。

四、宋、辽、金时期山西琉璃业的发展

916年,契丹族耶律氏建辽,先后与五代、北宋对峙二百余年。契丹族在北方的长期统治中,接受了许多中原文化的影响,辽三彩琉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山西大同(辽代平城)被做为辽的陪都,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琉璃业迅速发展。从辽墓中出土的三彩器物,釉面较厚,色调古朴,光泽逾千年而不减。器形有瓶、罐、盘、俑等。其中大同辽墓出土的三彩瓶,色泽尤艳。瓶颈有双柄,

身施绿釉，腹部有施黄釉的沥粉飞凤和牡丹纹图案，底边为白色，形制古拙，十分珍贵。此外，在离大同不远的朔城区杭芳园辽代栖霞寺遗址中，也发现过琉璃瓦残片，是辽代建筑上使用琉璃的佐证。朔城区吴家窑发现的琉璃残片有两种：一种为细坭土坯胎，绿釉微薄，与附近杭芳园栖霞寺辽代寺庙遗址中出土的琉璃相仿，似为辽代制品；另一种胎质粗糙，釉色浑厚明莹，似为辽、宋以后之物。

宋代琉璃器皿，虽不像唐、辽两代的三彩那样盛行，但也令人瞩目。山西所见，有瓶、枕、罐、壶、盒等多种，或为单彩，或为双彩，虎枕多为三彩。其中1982年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在离石城内基建工地发现的黄、绿、白三彩莲蓬蹲狮熏炉，造成型最佳，应为宋代琉璃器物中的珍品。炉口内沿刻有铭文：“己丑年壬申月己酉日辛时朱成造”。两耳上端内沿，刻有“呼延”二字。宋初呼延氏官职显赫。《宋史·列传》有：“呼延先锋赞，并州太原人。”“朱成造”，当为匠师的题记。由此看来，此间熏炉应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宋代唯一有匠师题记的琉璃器物。

闻喜县博物馆中，收藏有宋代三彩观音菩萨一尊。菩萨为坐像，发髻隆起，头上雕小佛一尊，宽衣博带，胸前佩有缨珞，双足垂于座下，神态娴静，略显笑意。用高岭土作胎，质地略糙。表层衣饰部分施蓝、翠绿及黄釉，发髻着黑釉，手足为白釉，面部呈白黄色。此外，还有一组绿釉马及俑出土于闻喜宋墓。马及俑皆红砖色胚胎，绿釉仅施于马鞍和俑的服饰部分，其余部分全为胎底本色，简洁古朴。

宋代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隆盛阶段，尤其注重装饰和色

调的运用。从绚丽斑斓的琉璃构件,到屋顶上的琉璃剪边,无论群体建筑或单体建筑,都力求形制与色调的统一,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效果。因此,自宋代以来,在宫廷、衙署、寺庙、祠宇等大型建筑上使用琉璃艺术构件,似乎已成规制。

山西保留的宋代建筑琉璃饰件不多。太原晋祠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太平天国九年(984),崇宁元年(1102)重修,殿顶琉璃大多为明代修葺时烧造,但其中还保存有少部分宋代琉璃瓦。介休城内后土庙三清楼上,还保存有少量宋代元祐二年(1087)创建时的筒瓦。太原南郊马庄熙宁二年(1029)创建的芳林寺大殿基址上,1973年曾捡得宋制绿釉瓦片数块。瓦以灰、黑两色粘土为胎,颇似宋木理纹瓷胎。绿釉已变成“银釉”,与晋祠圣母殿无异。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宋代海狮两躯。狮蹲于瓦背,气势雄壮,身首有力,这应该是寺庙建筑上的部件。

金代承袭宋、辽之制,琉璃业不断发展,在山西留下的建筑遗存十分珍贵。

朔城区内崇福寺弥陀殿上,金代琉璃鸱吻、垂兽、仙人、脊刹;绛县太阴寺大雄宝殿上金代琉璃垂兽;大同市内华严寺大雄宝殿与薄伽教藏殿上的金代琉璃鸱吻、垂兽和部分瓦件;高平定林寺观音殿上的金代脊饰、吻兽;晋城玉皇庙后殿上金代琉璃狮子和脊饰“二十八宿”……等,都是这一时期大型建筑物上使用琉璃瓦顶或琉璃构件剪边的实物证据。

朔城区崇福寺,创建于唐麟德二年(665),规模宏大。其

中弥陀殿,是我国辽、金时期的重要建筑之一。殿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殿顶上黄绿色琉璃剪边,正、垂各脊,瓦条垒砌,是唐代以来建筑上固有的规制。脊端琉璃鸱吻、垂兽、戗兽及脊刹、武士、沟滴、瓦件等,皆为金皇统六年(1146)的原作,保存基本完好。

大同华严寺内有辽、金建筑两座,一为大雄宝殿;一为薄伽教藏殿。大雄宝殿建于辽代清宁八年(1062),金天眷二年(1140)重建。殿上正脊两端琉璃鸱吻形体高耸,品数不一,色泽手法各异。北吻八品合成;南吻二十五品相接。北吻陈旧,吻高4.5米,吞口及尾部较长,胎质较红,绿釉略深,鳞部釉面著金黄色,在我国古建筑琉璃鸱吻中,规模之大,以此为冠。南吻新颖,以为后世仿古补造的。薄伽教藏殿,辽重熙七年(1038)建,金大定二年(1162)补葺。现存殿上两只琉璃鸱吻和垂兽,既不象辽代的鱼尾式样,也不同于元、明以后吻兽形制,应为大定时之物。其吻兽张口吞脊,吻尾前伸,后部塑有背兽。红泥作胎,龙口及鳍尾施绿釉,鳞片用金黄釉。釉面虽有剥落,但依然色泽晶莹。垂兽不似后世龙头模样,而略像麒麟,无角,鬓毛前倾,背面塑有兽形吞口。造型之殊,仅此一例。

金大定二十年(1180)重建的绛县太阴寺大雄宝殿上,保存有琉璃垂兽四只,胚胎、釉色、形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如出一师之手。红胎、绿釉,仅有兽面而无颈项。后部与瓦条脊相连,无疑为金代遗存。

位于高平市城东南的定林寺,寺史悠久。寺初建于唐代长庆年间(821—824),金皇统八年及泰和四年均有修葺。寺

中雷音殿顶脊饰、吻兽均为金泰和年间(1201—1209)重修时所制。殿顶脊刹略如塔式,下部吞口向背,中无龕楣雕饰,其上六角形叠涩束腰,四斜面各设力士一躯负重,上置莲瓣覆钵和宝珠。造型俊雅,雕工精细。其脊刹边沿处有题记:“泰和四年十一月造”。此殿顶琉璃饰件,在已知的宋、金琉璃遗物中,实属佳作。

宋熙宁九年(1076)创建,金泰和七年(1207)重建的晋城玉皇庙,重修碑阴刻有“琉璃匠元庆社李道真”。现在庙内琉璃,金、元、明三代遗物皆存,风格截然不同。其中后大殿正脊中央的狮子、脊侧的“二十八宿”仙人、后坡垂兽和前檐部份沟滴、瓦件,还是金代原作。狮座方形,似露盘式,侧面雕有盘龙两条,周设浮云衬托;座上狮子昂首而立,欲行又止,拂林躬身微侧,用力牵拉狮子头部,狮后足挺拔,作欲奔状,姿态雄猛矫健,与五台佛光寺文殊殿、繁峙岩山寺菩萨殿的金代狮子,有许多相似之处。正脊上雕饰着“二十八星宿”神像,即:张凤鹿、柳土獐、井木犴、觜火猴、昂日鸡、娄金狗、壁水獬、危月燕、女土蝠、斗目獬、尾火虎、房日兔、亢金龙、角木蛟、氐土貉、心月狐、箕水豹、牛金牛、虚日鼠、室火猪、奎木狼、胃土雉、毕日鸟、参水猿、鬼金羊、星月马、翼火蛇、轸水蚓。制作者分别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性格的二十八个人物来表现二十八位星君,并在他们的肩上、脚下或身侧雕有其化身动物。各像脚蹬祥云,手执法宝,面形丰润,衣着古朴,头部后有圆光,极像唐、宋彩塑和壁画上的形制。像后面脊筒上线刻卷草纹样,也是后代琉璃制品中所未见的。像均用粗坭土作胎,面部或白釉,或无釉两种;其它多施

黄、绿色釉。其中,黄釉略旧,绿釉偏浅。除后补的四尊外,均与晋祠、芳林寺、后土庙、杭芳园、栖霞寺等地残存的宋、辽瓦件极为相似。从地理上看,高平市与晋城是近邻,宋、金时同属泽州,也许这些均为金泰和琉璃匠李道真的作品。

五、元代琉璃业的兴盛

元帝国统一了宋、金长期对峙的分裂局面,为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山西琉璃业开始进入兴盛阶段,品种、造型、工艺、色彩等各方面,均较前有大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山西寺庙建筑的兴盛,琉璃建筑几乎遍及全省。目前晋北的五台;晋中的平遥、介休、汾阳;晋南的洪洞、翼城、芮城;晋东南的潞城、晋城等地区,保存有元代琉璃,其中不少还留有制作年代和匠师姓名。

元代创建的芮城永乐宫,各殿瓦顶上琉璃构件,制作技术极高。其建筑屋顶已逐渐用琉璃脊代替了瓦条脊,琉璃脊上有的还装饰各种花卉图案,是殿顶更加华丽。宫中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均建于建立大元国号前的中统三年(1262),殿顶全为琉璃剪边,主殿上铺设方心。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起了龙虎殿,脊饰沟滴亦为琉璃制品。三清殿的两个鸱吻,极富创造性。鸱吻高达2.8米,五品合成。红泥作胎,施孔雀蓝釉。整体为一条巨龙曲折盘绕而成,爪尾相融,微向前伸;侧面塑有龙王、雨师、流云等。这种以龙为主体的大型鸱吻,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尚属初创,为明、清两

代多样形式的龙吻,开了先河。正脊没有脊刹,两面堆塑有升龙、降龙、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和莲花、牡丹等花卉图案。脊筒以绿釉作底色,龙凤、花卉的釉色多用褐、黄、浅黄三种。四条戗脊在绿釉之上衬以金黄色牡丹,前端塑戗兽一枚,似欲飞奔。四角岔脊,雕有黄、绿仙人、押鱼、海马、狮子和坐于套兽之上的嫫伽(角神)。嫫伽,武将装束,孔雀蓝釉,瞪目张望,为他处所不见。纯阳殿、重阳殿和龙虎殿上的琉璃,与三清殿不同。正、垂各脊,皆用瓦条垒砌。纯阳殿正脊虽已制成脊筒,但两侧仍是瓦条纹饰,尚存唐、宋古制。三殿大吻高度在1.9米—2.1米之间,粘土作胎,黄、绿色釉。吻式前倾,尾部微向外卷,尾后插簪花一枚,也可说是明、清卷尾吻的先声。纯阳殿两吻上隅鳞甲间,在浮云之中雕有盘龙,一升一降,迂回自如。永乐宫各殿琉璃脊饰吻兽,造型、釉色全为元初之制,可惜没有觅得纪年和匠师题记,只有保存较好的至正二年(1343)的宫中供器琉璃香炉上,留有造作年款和匠人题记,尽管年代略晚,亦可弥补其不足。

供器中的香炉,是元代琉璃制作中的一个重要品类。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山西汾阳峪道河龙天庙琉璃香炉,十分可贵。炉为三足、两耳。足外侧刻有蝉肚纹样,上面凸出兽面;炉身正面雕牡丹花一枝;背面两枝,两条行龙串于其间;项下前后塑两个方心,方心内各雕莲花一朵;炉沿突出,上刻富贵不断头纹饰;两侧炉耳上、下直行,与明代香炉竖耳弧线向外者不同。炉用红粘土作胎,黄、绿色釉。两侧冲耳釉下,刻有“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塘成造”。